

我是這樣看「一國兩制」

在澳洲第五屆世界華商大會上的發言

霍英東

(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)

天災人禍 國弱民貧

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，長達四千餘年，有五十六個民族，在悠久共處中，是互相融合，又互相競爭，逐步結成唇齒相依，親密與共的關係。《史記》是一部中國通史，其中心思想是：各民族都是「炎黃子孫」；歷史上炎帝是「神農氏」，黃帝是軒轅，陵墓在陝西。在世界各地的華裔，每年都有人回去祭祀祖先。

公元前 2698 年進入夏朝，夏禹即位；公元前 1200 年左右是商代；公元前 1116 年是周朝；史家稱公元前 722 年至 481 年為東周，此間一百四十二年為「春秋」年代，但周天子喪失權力，諸侯爭霸，戰亂頻繁，比較大的戰爭就有三百多次，到「春秋」末期，只剩下十多個國家；「戰國」時期，於公元前 403 年至公元前 221 年間，互相征戰的結果，剩下七國爭雄，秦始皇滅六國，建立統一帝國；從那個時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凡二千一百餘年，安定統一盛治之年不過佔五分之一，衰亂之世卻近五分之四。在中國近代史中，從晚清鴉片戰爭開始，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中國人賤如螻蟻，承受八次外敵入侵的戰爭，被迫簽訂一千一百多個不平等條約，被掠奪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，和四十多億兩白銀，中國變為「病夫的遺產」，任人宰割。

十九世紀中葉，中國天災人禍，民不聊生，死於戰亂人數逾數千萬，為了尋找生路，不少人拋妻棄子，辭別父母，遠托異國。加拿大卡爾加里市有一個華人「百年滄桑」的歷史展覽，記載了1860年卑詩省有華工約七千名，1880年為了修建橫貫美洲東西太平洋鐵路，又徵募一萬八千多名華工。華工的生活異常艱苦，每建造一英哩CPR鐵路，便有四名華工喪生。香港中文大學前副校長鄭德坤先生，在《中華民族文化史論》中，引述他與朋友談起新加坡發展的掌故，「從1860年到1922年，這六十二年，新加坡華人入口總數逾千萬人，而1922年的統計，新加坡華人只剩下三、四十萬。南下的華人有多少為新加坡開發而喪生？這個二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島，沒有一寸土地沒有他們的血汗骨肉」。

從歷史事實看，中國人民站起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；中國人民真正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是在改革開放之後；中國人民真正洗雪百年恥辱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。這三件關係到民族存亡和長遠利益的根本大事，是中國人民吃盡苦頭，付出數不清的代價、長期不屈不撓地探索現代化道路的結果。

沒有強大的祖國 就不可能順利回歸

公元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，這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事，也是世界公認的大事。就在那一天，我親眼看著降下英國國旗，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，升起香港特區政府區旗；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巨變。如果中國還是五十年前那樣四分五裂，如果中國還是五十年前那樣經濟陷於崩潰的深谷，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，靠伸手向外國借債渡日，那末，香港的回歸，絕對是另一種局面。回歸前，一位外國記者路易斯·卡拉爾預言「香港必死」，他們希望看到香港回歸後，會出現血與火，發生搶劫、社會動盪不安的局

面。他的估計不是沒有根據的，從印、巴分治大屠殺之歷史，到現在的科索沃、東帝汶都是使人傷心膽寒的。香港順利回歸，「一國兩制」能夠實現，不是老天爺的賜予；回歸前後的日子絕對不是和平平的，困難和問題引起的衝擊一浪接一浪，這些預言家希望「一國兩制」失敗，他們現在還預言香港會「陰乾」，他們看到和誇大了一些負面的變數，他們懷念著從前的日子，他們依戀著《英皇制誥》和《皇室訓令》同時，他們依戀著過去踏在中國人民頭上的風光，他們不懂得，也不愿意接受中國人民已經不是處於俯仰由人、任人漁肉的時代，香港人能決定香港大局，是因為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做後盾。

香港在近代社會中，是內地與國際市場連接的港口，是中國與現代國際社會接觸的「契合點」，是海外三千萬華裔與祖國故鄉交往的樞紐，融匯了中西市場經濟模式。香港的繁榮安定，一直依靠內陸，經濟、技術、人才、資源都是依靠外來因素；「客似雲來，財源廣進」，香港的主要作用，是發揮港口集散、組織服務的作用，「出處不如聚處」；有利的地理位置，高效率的服務，與世界各地商貿關係密切，法律監管較為完善，公正透明度高、文明的管理規範，這些條件使香港成為世界著名的城市。

高瞻遠矚 實行一國兩制

香港回歸祖國，實行一國兩制。香港回歸之後是個甚麼樣？香港同胞是心存疑慮的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，內地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，「三反五反」、「土改」、「清匪反霸」、「大躍進」、「大煉鋼鐵」、「反右」、「文化大革命」、「上山下鄉」……我們都不理解，也很怕。1982年香港各方面的朋友去北京與中央的領導人見面，反映一些香港同胞的憂慮和想法。雖然香港與內地

只一橋（羅湖橋）之隔，但兩地人民生活有很大的不同，觀念存在差異，生活習慣、文化理念都不一樣。香港是實行市場經濟，在英國人的統治下，也有一百多年了，因此，回歸之後的香港將會是怎麼一個樣子，說不擔心是騙人的。以後中央逐漸明確提出，要實行「一國兩制」，「港人治港」，「五十年不變」。那末，甚麼是「一國兩制」呢？以後有人解釋「一國兩制」就是「馬照跑」，「舞照跳」，經濟模式照原來的樣子不變。話是這樣說，還是疑慮重重，有條件的紛紛留後路，準備移民。到回歸那一天，親眼目睹降下英國旗，升上中國旗；彭定康返祖家，董建華先生被選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，回歸就是那麼平穩，那麼順利。目睹這一過程，特別是經過這兩年零三個月的日子，見證中央認真貫徹「一國兩制」的政策。香港居民的生活方式一如舊日，快活谷、沙田馬場仍然人頭湧湧，去年(1998)馬季投注額超過800億港元；皇后大道、砵甸乍街、瑪麗醫院還是沿用一如往日的舊稱；18萬公務人員沒有變動，政府官員一直擔任原來的重責；特區政府還享有更多的決策權，突破過去事事請示英廷的束縛；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利益，特區政府官員敢於提出不同的意見，與採取行之有效的辦法。如此巨變後仍能夠有這樣穩定的局面，使許多人感到「跌眼鏡」，承認香港的確是保持了原來的制度，從而相信香港的將來會更好，相信「香港明天會更好」。這兩年不少人又從外國回流香港，因為香港有廣闊開拓的天地，看到回歸後的香港仍舊有很好的發展前途。

回歸之後，香港遭遇和面對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，諸如「亞洲金融風暴」的衝擊，「禽流感」、「殺鷄」、新機場啟用的混亂、推行母語教學、港人子女居港權、中央釋法……這些事交相纏擾，社會上「公說公理」「婆說婆理」，問題是有些傳媒混淆是非，顛倒黑白。上述發生的事情難道彭定康在位時就不會發生？

以赤鱘角新機場的建設為例，當時地址是誰選定的？當時建設機場的大權是誰掌握著？機場運作大權又是誰掌握？貨運站的大老闆又是誰？其實大眾都心知肚明，並非特區政府的過錯，董先生實為代罪羔羊而已。把一切歸咎於特區政府，這是很不公正，也很不公平的。又如推行母語教學，作為中國人不懂得自己的民族語言，這不僅是歧視偏見，而且貽誤子孫。很多華僑在外地總是想方設法，使自己的後代不要忘記母語。猶太人，不論在那一個國家，那一個地區，都教育自己的子弟學習希伯來語，以懂得母語為榮，我們為甚麼卻歧視甚至仇恨母語教育？！

改革開放 走現代化道路

中國當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堅定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，圍繞經濟建設，可以明顯地看到國內各個領域的變化，人民生活的改善，綜合國力的提高，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，應付洪災的實力，對環境保護採取有效的措施……這些事以前沒有力量做，連想也不敢想，「人窮百事哀」，呼天搶地有甚麼用！「賣豬仔」把自己當奴隸一樣賣到外地當勞工（苦力）。甚至走去黑非洲、巴西亞馬遜河區尋找「桃花源」。1997年我曾經訪問過俄國，他們國土遼闊，橫跨歐亞兩大洲，從黑海到白令海峽，太陽永遠照著他們的土地，物產豐富，鑽石、黃金、石油、鐵、煤礦、森林、草原等可以說樣樣都有，科學技術還是站在世界前列，文化藝術方面人才輩出，托爾斯泰、普希金、柴可夫斯基、烏蘭諾娃……；軍事方面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，從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勝利到攻克柏林，直至消滅日本的關東軍，其成就之大，在人間永遠留下不朽的光輝史詩。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，轉眼之間分崩離析，我認為根本原因是因為窮，沒有搞好經濟，盧布一再貶值，連軍餉都發

不出，靠伸手借債度日，人窮志短，社會風氣頹廢。蘇聯過去的輝煌成就，一下淪落如此，不能不使人有滄桑惋惜之感。

「一國兩制」能夠實現，就是靠改革開放，就是靠國家經濟建設取得突出的成就。我們十二億人口去年有八萬多億元人民幣的存款，有壹仟四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，這意味著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起了根本性的變化，保證了經濟建設的持續發展及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，加強了我國經濟的實力和競爭力。中國人民從仰人鼻息，到能夠自立自強，現在可以說是真真正正地站起來了，對付別人無理的欺壓，中國人民完全有力量可以保衛自己。

「一國兩制」是國家睿智的決定，從大局考慮，從歷史與實際出發，這個決定對國家建設有利，對香港有利。這兩年多來，中央人民政府是堅定地貫徹一國兩制，對香港特區政府，對董建華先生是完全信任和支持的。外界輿論包括美國的和英國的，也承認「一國兩制」是成功的，是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矛盾的範例。

中國要走現代化的道路絕非平坦，從幾千年封閉的疆土破繭而出，是脫胎換骨的大事。事業成敗決定於人，而決定國家民族的進步，是取決於人的素質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人的素質的提高，觀念的轉變，絕非短時間可以實現。這五十年可以看到，中國變化很大，發展很快，而且各個領域尚在逐步改善之中。我確信中國是有決心、有力量去克服當前社會存在的各種弊端，這條路是曲折的，許多問題和困難也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，但中國的確是在發展進步中。中華民族將會以一個有高尚道德、有現代化科學文化的新面貌與世界各族人民友好相處。

密切粵港關係 建設安定繁榮的香港

人們對香港回歸祖國的認識，在觀念上互相參差不同，有人把「兩制」與「一國」對立起來，但沒有「一國」又何來「兩制」？香港離開「一國」，既不可能安定，又不可能繁榮。就以經濟而論，香港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積，山多地少，資源缺乏，食水也仰給於內地。香港今天的地位，是因緣於天時地利，背靠內地，成為通向世界市場集散港口，這種特殊的優良的地理條件，加上一百多年的市場習慣模式，市場的運作，按市場的規則處事，沒有特權，透明度高，監管制度比較健全，使之能成為世界的重要海港。比如此次處理「廣南集團」一案，根據實情，逮捕和起訴前董事總經理及有關負責人，審查賬目，對其盜竊公司財產一事，排除地方、部門利益的保護主義干擾，依法處理，並公諸於社會。如果沒有健全的體制保障運作，政企不分，公私不分，企業很快便會陷於腐敗，而至於倒塌，國家的經濟建設亦難於發展。香港應該繼續發展市場經濟，使之更趨完善。

當前重要的是，如何認識「一國」與特區政府的關係。過去除了歷史及政治原因的隔膜之外，港英政府採取了許多限制性措施，把愛國視為罪行，封閉親中社團，逮捕親中人士；在社會上排斥在愛國學校受教育的學生就業；採取明的、暗的手法孤立愛國人士；毀掉勤奮、自強、友愛、互助的傳統美德，使青少年不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，甚至可鄙地散播下流的、暴力的、色情的、不道德的東西，去毒害年青人，使之熱衷於「煉精學懶」、「搵快錢」、「炒即日鮮」、「博一博」、「上岸就是神仙」的撈家心態。1994年10月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談及儒學對新加坡的影響時指出：「從治理新加坡的經驗來看，特別是1959年至1969年那段難忘的日子，使我們深深地相信，要不是新加坡人民都受過儒學價值觀的

熏陶，我們是無法克服那些困難和挫折的」。一個健康的社會，人與社會、人與朋友、人與家庭都應該建立在一個有道德倫理的基礎之上。

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東西，當然不可能在短期內可以解決。但特區政府今日應該沒有禁忌，履行人民及中央政府所給與的信任與權責，堅決維護「一國兩制」。

香港的安定繁榮，與內地、特別是廣東，是密切相關，是「一榮俱榮」、「一損俱損」的血肉相連關係。要明白的是，香港是個優良港口，外地人來香港，不是僅僅因為香港有個第一流的機場，不是僅僅來看看香港大佛、沙田大圍、淺水灣、米埔的溼地，他們要在香港看中國大陸，過去如此，今日亦復如此。在廣東有七萬多家外地企業，有將近1,000多萬工人，廣東出口總額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多，珠江三角洲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工業區。其腹地鄰及湖南、江西、貴州、雲南、廣西五省，人力資源、土地資源、旅遊資源都異常豐富。廣東粵北地區，就有禪宗鼻祖的南華古寺，有南雄的珠璣巷，有梅嶺，有仁化的丹霞山，有原始森林，有客家大圍，有唐代首相張九齡的風度樓。就以珠江來說，景點名勝之多，實不勝數。香港地處珠江口，處於南中國港灣的優越的地理位置，新加坡和台灣都不能取代，香港為甚麼不充分利用這有利的地理條件，有利的經濟關係，有利的血緣關係？近一個多世紀，香港是華僑出入過境的重要埠頭，現在不少人在深水埗、北角有過他們青年時留下的足跡，香港是他們的第二故鄉，今天的香港應該繼續發揮聯系海外華人的樞紐作用。發展粵港之間的合作，是保障香港安定繁榮最重要的決策。希望香港經濟界朋友、香港社會人士和特區政府對我這樣的考慮能夠給予關注和批評。

在座各位朋友來自世界各地，絕大部份對香港是熟悉的，對香港是會關心的，希望我的發言不會離題並使大家失望，謝謝。